

全视角

看美国

丛书

后外交时代： 不受约束的美国

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外交何去何从
美国政界高层的全景图

[美] 伊沃·H·达尔德尔 等著 刘满贵 译



America Unbound

新华出版社

全视角 看美国 丛书

后外交时代： 不受约束的美国

伊沃·H·达尔德尔 著
[美] 詹姆斯·M·林赛

刘满贵 译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外交时代：不受约束的美国/（美）达尔德尔，（美）林赛著；
刘满贵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5

（全视角看美国）

ISBN 7-5011-6668-4

I. 后… II. ①达…②林…③刘… III. 外交政策—研究—美国
IV. D8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6231 号

京权图字：01—2004—2586

America Unbound

by Ivo H. Daalder and James M. Lindsay

Copyright © 2003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4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专有权属新华出版社

**后外交时代：
不受约束的美国**

〔美〕伊沃·H·达尔德尔 詹姆斯·M·林赛 著

刘满贵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编：100043）

新华出版社网址：<http://www.xinhua.com>

中国新闻书店：(010)6307201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神剑印刷厂印刷

*

787毫米×980毫米 20开本 13.5印张 190千字

2004年5月第一版 2004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6668-4/D·1060 定价：28.00元





目 录

第一章	布什革命·····	(1)
第二章	乔治·布什及其幕僚·····	(21)
第三章	布什的世界观·····	(45)
第四章	组建团队·····	(65)
第五章	执政的头八个月·····	(81)
第六章	“9·11”事件·····	(103)
第七章	踏上进攻之路·····	(131)
第八章	布什战略·····	(156)
第九章	不可避免的摊牌·····	(174)
第十章	伊拉克战争·····	(196)
第十一章	谁是下一个·····	(232)
第十二章	权力的危险·····	(253)

第一章 布什革命

2003年6月初，当总统专机“空军一号”飞越巴格达上空、乔治·W·布什透过舷窗俯瞰大地的时候，他完全有理由欣喜不已。他刚刚成功地结束了对欧洲和中东的访问。布什此次出访的首站是华沙，在那里，他有机会亲自向出兵参与伊拉克战事的两个欧洲国家之一波兰表示感谢。随后，他到俄罗斯参加了圣彼得堡建市300周年的庆祝活动，并和普京正式签署了两国交换《俄美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批准书的备忘录。接着，他飞到阿尔卑斯山脚下的法国小城埃维昂，出席了西方八国集团首脑峰会。之后，他抵达埃及城市沙姆沙伊赫，在那里与持温和立场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先行会晤，然后前往红海之滨的约旦城市亚喀巴，与以色列总理沙龙和巴勒斯坦总理阿巴斯一起讨论和平路线图计划。布什此行的最后一站是卡塔尔的多哈——美国中央司令部所在地，驻扎在那里的美军以雷鸣般的掌声欢迎布什的莅临。此刻，布什俯瞰着这座美军刚刚攻占数周的城市，向他的顾问们指点着下面的地标。就在这个时候，“空军一号”飞行员微微摆动机翼，得意地做了一个欢庆胜利的空中动作。

布什此行的七天六国之旅，就许多方面来说，是一次庆祝美国赢得伊拉克战争的胜利之旅——在布什出访中会见的

各国首脑中，许多人一直反对他发动这场战争。但在布什及其顾问班子的眼中，此行具有更广泛的意义，他们将其视为对布什领导价值的确认。在 2000 年的总统竞选中，来自中部内陆地区的布什一直被讥讽为“无知的家伙”。就任总统初期，他也一直遭受抨击，说他背弃久经考验的民主党传统，对美国盟友的忠告置之不理。然而，如今布什横跨欧洲、中东时的形象，并非一位赔罪的忏悔者，而是一位博得尊敬的领袖。

在“空军一号”飞越巴格达上空的时候，布什完全有资格宣布自己已经成为一位格外有影响力、懂外交政策的总统。他像为数不多的其他几位美国总统一样，主导着美国的政治舞台；他是本届政府不容置疑的主人。他增强了美国人民的信心，并说服他们服从他的领导。他在放弃冷战条约、反恐怖、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等许多问题上表现出坚定信念。他大肆挥霍可观的政治资本，而不会将其贮藏以备未来之需，他在制定政策上大胆、主动的无畏魄力始终让他的抨击者感到汗颜。成功的决心一直激励着他，他从来不会因为担心失败而止步。当他在尖锐批评中坚定地追求自己目标的时候，只要客观形势允许，他总是表现出非凡的自负。

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布什发起了一场美国外交革命。这次革命并不是要改变美国海外目标的革命，而是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革命。在他执政的头两年半时间内，他或是摒弃或是重新阐释了许多支配美国参与海外事务方式的重要原则。他特立独行，更倾向于倚仗美国的实力采取单边行动，不怎么主张依赖国际法和国际组织解决问题。他推崇先发制人的主动原则，不再强调威慑和遏制的被动战略。他提倡将禁运制裁、先发制人和导弹防御等作为防止核扩散的手段，

贬低美国对根据条约确定的非核扩散国家的传统支持。对于他所憎恶的政权及其领导人，他宁愿将其推翻，而不愿意与其进行直接谈判。在获得海外支持方面，他愿意依靠特定情况下的心甘情愿的盟友，对持久性结盟并不怎么感兴趣。他终结了美国坚持了数十年的支持欧洲一体化政策，利用欧洲内部的分裂谋取自身利益。他试图将各个大国在共同的反恐怖事业联合起来，却否决了一项在两个大国之间寻求平衡的政策。通过改写美国介入世界事务的规则，这位在政治生涯中始终被视为才智不足而未受到重视的政治家，在国内外政坛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不过，好的开端未必总有完美的结局。就在布什透过“空军一号”的舷窗俯瞰巴格达的时候，已经出现了麻烦即将临头的迹象。驻伊拉克美军发现自己已经陷入游击战制造的麻烦不可自拔。面对美国的不可一世和伪善，其他国家的愤怒日渐膨胀。一些关系亲密的盟国公开谈论的也不再是如何与美国进行良好的合作，而是如何限制美国。就在总统专机轻摆机翼炫耀胜利心情的时候，一个新的问题开始摆到华盛顿面前：布什的外交政策革命所付出的代价是否会淹没其带来的利益？

美国应该如何介入世界事务？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是一个老问题。《美国宪法》刚刚通过四个月，英国和法国之间就爆发了战争，在美国的缔造者们面前摆上了一道难题。乔治·华盛顿总统最终选择了中立，让英法双方的支持者都很失望。这位福吉谷之战的英雄考虑到，假如美国介入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那么，共和政府很可能连微不足道的小革新都会流产。

华盛顿担任总统期间，美国与欧洲的关系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他在庄严宣布决定辞职回到可爱的家乡佛农山庄的演说中，详细论述了这个问题。他鼓励人民在对外关系中追求和平，保持正常的贸易往来。“政策、人道主义和利益关系告诉我们，要和所有的国家和睦相处，大方交往。”但他告诫人民，不要将自己的政治命运和别人的决定绑在一起。华盛顿忠告说：“我们真正的政策是，回避与外部世界任何部分的永久结盟。”他的观点是要把政治结盟限制到最小的程度，道理非常简单：“欧洲拥有一整套根本利益，但这些利益或是与美国毫不相干，或是距美国极其遥远。因此，欧洲必然会经常陷入论战，但从根本上说，他们争议的事情与我们关心的事物毫不相干。”^①

华盛顿在他离职演说的结束语中说：“我不敢期望（自己的忠告）会产生我所期望的强烈、持久的影响。”^②华盛顿完全不必担心，他对美国与欧洲关系的设想——既要与欧洲保持愉快的贸易关系，又要保持一定距离——很快即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1821年7月4日，约翰·昆西·亚当斯〔译者注：第六任美国总统（1825—1829）〕在参议院发表讲话时，对这种观点进行了生动的概括。他说，美国为那些为自由和独立而战的人民欢呼，“但她不会走出国门去寻找恶人以便铲除。她是所有自由和独立的祝福者。她只是自己的拥护者和维护人。”根据亚当斯的讲话，美国坚持干自己的事情，那是因为干涉别人的事情将有悖于自己所主张的独有道德观。“美国政策的基本格言将在不知不觉中从自由变为暴力……美国可能会变成世界的独裁者。美国将不再有能力统治自己的灵魂。”^③

然而，即便是自由、民主的灵魂，也经不住已变环境的

诱惑。亚当斯发表上述讲话的时候，美国仅有 24 个州，国土并未连贯成片，在密西西比河西岸，只有密苏里和路易斯安娜两个州。直到 19 世纪末期，美国才成为横跨北美大陆的工业巨人。经济巨头的新地位，使美国内部滋生出日益膨胀的帝国雄心。知识界运用当时流行的社会进化论，将领土扩张鼓吹为美国优越的展示和国家生存的关键。教会团体将美国的帝国主义视为向世界未开化地区传播基督教的手段。商业利益集团希望通过为美国产品开辟新的市场渠道，获得大把赚钱的机会。反帝国主义者，如安得鲁·卡内吉和马克·吐温，向这些扩张观点提出了愤怒的质疑，但是，他们打的是一场必败的战争。正如威廉·麦金利〔译者注：美国第二十五任总统（1897—1901）〕的国务卿约翰·哈伊所言：“没有任何人、任何团体能够为阻挡普天认同不可阻挡的大潮流而战斗；没有任何聪明、任何声望可以阻挡时代的精神。”^④

随着西班牙—美国战争的爆发，帝国主义者一直等待的机会来了。这场战争的支持者喜欢将其称为“辉煌的小战争”——来自这场战争的意外横财，就是建立了一个从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延伸到太平洋的菲律宾的帝国。面对稳稳到手的胜利，那些担心如果美国走出国门去“寻找恶人以便铲除”会使美国失去自己灵魂的顾虑很快就消失了。在西奥多·特迪·罗斯福〔美国第二十六任总统（1901—1909）〕针对“门罗主义”〔译者注：詹姆斯·门罗，美国第五任总统（1816—1824）〕（自首次提出后已被淡忘达 70 年）所做的补充——“罗斯福推论”的影响下，华盛顿主动承担了西半球的警察角色。罗斯福这位美西战争中的骑兵否认“只要涉及到西半球的其他国家，美国就会垂涎每一块土地，对每

一项计划都感兴趣。”不过，他坚持认为，在拉丁美洲国家不能妥善处理自己国家的经济、政治事务时，美国不能袖手旁观。拉丁美洲国家“需要认识到，这种独立的权利不能与好好运用权利的义务割裂开来”。^⑤在罗斯福及其继任者眼中，拉丁美洲国家未能用好独立的权利。1904年至1934年间，美国向拉丁美洲派遣过8支远征军，接管过两次关税征收权，实施过5次军事占领。加勒比海很快就落了个“门罗湖”的绰号。

在定义国家利益的斗争中，国际主义派利用西班牙—美国战争以及补充“门罗主义”的“罗斯福推论”，首次战胜了孤立主义派。然而，国际主义派的事业很快就陷入了困境。帝国的代价就是问题中的一部分。美国的新事业并非总是那么容易地靠拢华盛顿的规则。在菲律宾，美国发现自己不得不对叛乱进行血腥的镇压。在美国占领的几个加勒比国家，占领军没有能够带来罗斯福曾经承诺的稳定局面。国际主义派很快就面临了另一个更为严峻的挑战。而且，这一挑战并非来自孤立主义派，而是产生于国际主义派阵营内部。

1913年，伍德罗·威尔逊就任总统。威尔逊决心集中精力处理好国内事务，在宣誓就职前夕，他曾经对一位老同事说：“假如本届政府不得不以处理外交事务为主，那真是命运的嘲弄。”^⑥然而，命中恰恰注定威尔逊必须处理外交事务。如今，威尔逊的国内政策早已被淡忘，而他的外交政策却已经成为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遗产。威尔逊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的成就——他根本没有看到自己提出的新世界秩序成为现实，而是在于他的远见——美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这个远见，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导美国的政



治策略。

威尔逊和他几乎所有的前任一样——引人注目的例外是特迪·罗斯福——坚信“美国例外论”。“似乎上帝的天意就是要留下一片处女地大陆等待一个和平的民族来开垦，而这个民族热爱自由和人权的程度远远超过热爱其他任何东西，必将要出现和建立一个没有私心的联邦。”^⑦然而，尽管一直有人提及“走出国门去寻找恶人以便铲除的话，美国将会失去自己的灵魂”的断言，但威尔逊却把它颠倒了过来。他的自由国际主义阐明美国广泛介入世界事务的道德观点。

1916年，威尔逊在国会发言时说：“我们坚持按照我们自己选定的国家发展界限决定安全范围。不仅如此，为了其他国家，我们也需要这样做。为了个人自由和国家的自由发展，面对会给我们自己带来影响的事件和动向，我们并不限制自己的热情。我们觉得，无论在哪里，都能见到一个努力在艰难的独立和人权道路上跋涉的民族。”^⑧令人不足为怪的是，果然，当威尔逊要求对德国宣战——他竟然让美国卷入了欧洲战争，真是令人难以思议——的时候，他根本没有辩解说参战的必要性是因为德国在威胁美国的利益。更确切地说，美国必须参战，是因为“必须让全世界具有民主的安全保障”。^⑨

威尔逊致力于建立一个保障民主繁荣的世界，其行为本身就是具有革命性的。他的远见中另一个同样具有革命性的是他的信念——创建那样一个世界的关键，在于扩大国际法的影响范围，建立国际组织。这位前大学校长呼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酝酿一个能够“不分国家大小，相互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国际协议。^⑩1918年12月，他参加了巴黎和会，以便说服深有疑虑的欧洲各国领导人接受他的思

想。最终，虽然他不得不在自己计划中的许多细节问题上妥协，但他在核心问题上取得了成功。1919年7月签署的《凡尔赛和约》，建立了“反对外来侵略，尊重、维持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和现存政治独立”的国际联盟。^⑩威尔逊回到美国，深信“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集体安全思想将会阻止战争，更新世界的政治观念。

国际联盟的思想，对于美国政治界来说也是革命性的。威尔逊要求美国人不仅仅要抛弃对卷入结盟的厌恶，还要更有作为。毕竟美国是作为“关联”大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而不是作为传统上不情愿与其他国家建立军事联盟情结中的“结盟”国家参战的。他要求美国人充当一个为保护成员国安全而努力尝试的国际组织的排头兵，不要顾及这些成员国可能会距离美国海岸线多么遥远。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提议将会遇到阻力。

参议院对《凡尔赛和约》的否决，通常总是被列举为传统孤立主义派的一次胜利。毫无疑问，孤立主义派是《凡尔赛和约》最激烈的批评者。这些孤立主义派自称为“不可调和的”顽固派，其领军人物是来自爱达荷州的参议员威廉·博拉。尽管博拉参议员从来没有离开过美国国土半步，但他却是名噪一时的世界事务专家。这些顽固派都是激烈反对美国与外国结盟的传统孤立主义分子。博拉坚信，如果让他说了算，国际联盟必将会成为“被大海淹没的两万个联盟之一”，他要把“这种背叛祖国的阴谋”“埋葬到地狱去”。他声称，“即便是耶稣基督再次光临人世并表态支持国际联盟，我也要坚决反对。”^⑪

虽然博拉及其顽固的伙伴们缺乏足够的票数稳操胜券，但是，参议院中许多最狂热的国际主义派和孤立主义派人士



也都反对《凡尔赛和约》。威尔逊要把美国操心的范围扩大到边界之外，并不是让他们恼火的事情。他们都在为美国边界之外的事情操心。他们只是反对威尔逊心中的介入世界的方式。这些包括绝大多数共和党人和许多民主党人在内的反对国际联盟的国际主义者认为，美国在处理海外事务时必须游刃有余，不能把自己的命运系于其他国家的反复无常和利益上。他们指责国际联盟将会超越美国宪法，篡夺美国国会宣布战争的权力。反对国际联盟的国际主义派阵营领军人物是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亨利·卡勃特·洛奇，他在向自己的同僚们提问时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你们愿意将自己的士兵和水手们部署到其他国家吗？”^③

一时间，反条约势力的胜利预示着洛奇和其他人所热衷的游刃有余政策将持续下去。然而，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初，这种单边国际主义开始让路于日益兴盛的孤立主义情绪。由于美国陷入经济大萧条，战争乌云也笼罩在欧洲的上空，美国人逐渐退回到“美利坚堡垒”中。部分孤立主义者提出，战争不会发生。1939 年 7 月，博拉参议员信心十足地预测：“我们将不会陷入战争。德国人没有做好战争准备……我有自己的情报来源。”^④其他一些人承认战争有可能会发生，但是美国最好的选择是远离战争。不管是否出于此因，无论是德国入侵波兰，还是大不列颠之战乃至德国打到苏联，都没有使绝大多数美国人确信是该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只有珍珠港事件才让美国人认识到了这一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人面临的外交政策问题，基本没有美国在海外将会有何作为的问题。从任何标准上说，美国都在操纵着世界。过去，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达到过这种

程度。所有其他的大国，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被战争摧毁为废墟。而从战争中崛起的美国正好相反，不仅没有遭受战争的创伤，反而远比宣布参战的时候强大得多。至此，美国成为世界最强的经济大国。它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和空军。此外，只有美国掌握世界上最可怕的武器——原子弹的秘密。

美国人此时面临的外交政策问题，从根本上讲，就是美国在海外应该如何作为的问题。许多美国人期望让远在欧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孩子们尽快回家”，重新回到“正常”生活之中。有些人警告说要防止孤立主义卷土重来。然而，国际主义派内部本身却在下述重要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美国应该从地区着眼还是从全球着眼定义自己的利益范围？对美国安全的威胁到底是什么？美国应该如何应对这些威胁？

回答这些问题的重任，落在从许多方面而言均缺乏足够准备的哈里·杜鲁门总统肩上。杜鲁门坦诚地承认自己“并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思考者”。^⑨作为堪萨斯城民主党政治机器的产物，他积累了处理国内问题的政治经验。在意外地被富兰克林·罗斯福选定为竞选伙伴之前，他在参议院供职十年，声望平平。1945年4月罗斯福去世的时候，杜鲁门担任副总统尚不满三个月，还没有被纳入政府的外交政策班底。甚至在宣誓就任总统之后，他仍然不知道美国正在制造原子弹。

无论杜鲁门怎么缺乏经验，但他仍然表示，要在避免重复伍德罗·威尔逊的错误前提下沿着自己的目标前进。在七年的总统任期内，杜鲁门重新修订了美国的外交政策。1947年3月，这位昔日的堪萨斯城杂货商来到国会召开的两院联席会议上，宣布了后来众所周知的杜鲁门主义：“美国必须

奉行支持那些自由民族的政策，支持他们抵抗全副武装的少数国家的蓄意镇压，抵抗来自外部的压力。”^⑥三个月后，他的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毕业典礼讲话中推出了马歇尔计划，宣布美国将要发挥的一个主要作用就是复兴饱受战争创伤的欧洲。两年之后，杜鲁门签署了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协定。在他落笔之际，杜鲁门彻底抛弃了美国对“结盟”的传统厌恶，正式宣布华盛顿将自己的安全利益不可解脱地与西欧的安全利益连接到一起。

杜鲁门外交政策革命的特点，在于强权与合作的结合。杜鲁门愿意运用美国的强大势力重整世界事务，有着一箭双雕的目的，既能服务于美国的利益，又能提升美国的价值。不管怎么说，杜鲁门及其幕僚考虑到，如果把美国的实力嵌入多边组织中，维持下去会更容易，同时也减少了与他国结怨的可能性。在总统任期内，杜鲁门见证、倡导了诸多国际秩序基础结构部门的创建：除美洲国家组织外，还有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等多边国际组织。在创建这些机构的过程中，杜鲁门创立了一个先例：即便美国有实力在认为合适的时候采取行动，美国也应该接受（至少在概念上）在国际法限制的框架内采取行动的概念。与当年国际联盟激起的大规模论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参议院以压倒多数的票数通过了这一多边方式的议案。

但是，杜鲁门选择的外交政策并没有引起满堂喝彩。不过，挑战并非来自孤立主义者。从美国军舰“亚利桑那”号[译者注：1941年珍珠港事件中遭日本袭击沉没的军舰]涌出的滚滚浓烟显示出“美利坚堡垒”的脆弱。抱怨来自持强硬路线的保守派人士，他们责备杜鲁门容忍苏联的政策过于懦弱。这些批评家认为，对于美国来说，解放落入苏联控制

中的那些国家，不仅会体现出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具有战略上的利益。杜鲁门否决了这些运用武力“击退”苏联的呼吁，他认为由此引起的不可避免战争代价太高。

不久，“击退”论的建议者们以为自己找到了领军人物，那就是杜鲁门的接班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的竞选中批评了杜鲁门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处理朝鲜问题的政策。在共和党正式颁布的竞选纲领中，公开抨击遏制政策是一个“消极、徒劳、不道德”的政策，它将“无数生灵遗弃到专制主义和邪恶的恐怖主义手中”。^⑩

然而，竞选是一回事，执政却是另一回事。艾森豪威尔掌权以后，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他的行为清楚地表明“把华盛顿的政府从民主党手中解放出来要比在东欧与苏联争夺影响重要”。^⑪1953年7月，苏联军队在东德镇压叛乱的时候，这位前盟军最高司令官袖手旁观。次月，他以与平壤签署停战协定的方式而不是以进攻北朝鲜的方式结束了朝鲜战争。第二年，法国请求美军为在奠边府陷入重围的法国人解围，也遭到了他的回绝。又过了两年，苏联坦克驶进匈牙利平息另一起反抗共产主义统治的叛乱，华盛顿仍然无动于衷。艾森豪威尔在解释美国的不作为时说，美国并非胆怯，而是出于谨慎。任何采用武力解放东欧的尝试都可能导致核战争，将美国城市化为硝烟弥漫的核废墟。由于犯错误的代价如此之高，“击退”策略的呼声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在后来的半个世纪中，艾森豪威尔对杜鲁门的外交政策纲领情有独钟，从而进一步巩固了美国处理世界事务的基本方式。虽然美国在越南战争中遭致惨败，但其外交政策的基调一直没有变化。美国在海外拥有广泛的利益范围，必须时

刻做好保卫的准备。华盛顿之所以积极培养盟友，那是因为存在一个超级大国敌手的世界上，如果没有这些盟友是极其危险的。国际组织，尤其是军事联盟，是外交政策的关键工具。

然而，与此同时，无时不在的苏联威胁覆盖了知识界伍德罗·威尔逊学派和亨利·卡勃特·洛奇学派争执不休的声音。威尔逊学派的后人们怀念对国际法的贡献，他们感到自豪的是，美国倡导创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并通过创建过程奠定了在国际事务中逐渐扩大法律规则范围的基础。洛奇学派的后人们渴望游刃有余政策，他们为美国能以强大的财富和军事实力保证自己在国际组织中的主导地位而欣慰。比如说，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美国就不仅仅是具有人口数量优势的“另一个意大利”，它是一个能够为联盟提供最终安全保证的超级大国，因此在决定联盟政策时拥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当多边组织拒绝服从美国的意志时，美国不仅能够采取单边行动，而且经常也是这样做的。

随着冷战的缓慢发展，美国的盟友们变得不那么愿意听从美国的指挥了，强调合作者和强调自由使用武力者之间的分歧日益加深，变得更加难以掩盖了。在前者认为存在建立新多边组织的可能性的时候，后者却在谴责许多国际组织的效力问题，对这些组织限制美国任意行事的能力感到失望。20世纪90年代，由于苏联垮台，这些分歧骤然摆到桌面上来。那些强调国际机构和国际法的人突然失去了多年来压制强力派的王牌——单边行动可能会产生难以承受的高昂代价的概念。

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外交政策论战，起初被误解为